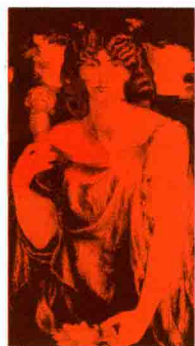


己



Memory

赵静蓉
主 编

己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记忆

Memory

赵静蓉
主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 / 赵静蓉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668 - 1509 - 5

I. ①记… II. ①赵… III. ①记忆—文化社会学—文集

IV. ①B842. 3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0430 号

记 忆

主 编 赵静蓉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潘江曼

责任编辑 潘江曼

责任校对 崔军亚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 邮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我一直认为，在所有关于人的知识和情感中，记忆是最神秘的。一个人的记忆能够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个体的所有一切，它有色彩、有温度、有感觉，甚至就像一个能够溢出我们自身而独立存在的生命体那样。当我们对现实感到困惑的时候，我们转向寻求记忆的帮助；当我们对未来抱有幻想的时候，我们也希冀得到记忆的支撑。在我们的内心世界，记忆就像一种未被命名的信仰，从来不曾离弃我们。

然而，记忆也是最沉默的。它不能主动言说，只能等待被唤醒；它也无法自行呈现，只能借助符号被“赋形”。“符号的所在，是基本存在的结果”，“所有世界和命运都从无意识中凸显出来，凝结为一个符号，一种品味，一种嗅觉，一种香水，一种姿态”，是符号印证了记忆的存在，而记忆也体现了符号的价值。

因此，我相信，当我们谈论记忆的时候，记忆才是鲜活生动的。而我们的言说，也会即刻成为记忆。记忆因而是生生不息的，它也总在隐晦和显明之间瞬息变换，令我们惊叹，也令我们成为更完整的人。

2013年12月21日，我在暨南大学主办了一个名为“文化·记忆·历史”的研讨会。二十多位青年学者响应我的邀请，在事务繁忙的年末抽身出来，欣然相聚广州。会议只有一天，包括两个半天的正式讨论和一个晚上的“故事会”，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比我参加过的任何单天会议都要密集。——我无法不这样安排。因为在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厦门和重庆等地高校的十七名校外学者里，有令我受益匪浅的师长，有我深以为然的青年才俊，还有我热爱的男神和女神。他们无一不严肃认真地思考了关于记忆的问题，并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提出了诸多闪光而精彩的见解，更令我深深感动的是“故事会”上他们的朴素和真诚。宏斌大哥的犀利评点、广胜师兄的“杨——建刚”、赵牧学友的“坏苹果和坏梨子”、大先的“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张均兄的“内急创伤”、志强老师的精彩点评、国华师兄的冷幽默、伟胜师兄的激情发言……太多有趣的事情令我回味无穷。这样无所顾忌地讨论、交锋，这样像少年一样彼此讲述和倾听，这样怀抱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学术的热情，是多么令人向往！

那次会议开启了某种新的对话模式，也巩固了我对友谊和学术的信心，对我而言，它的意义非同小可。会议过后几天，2013年圣诞节的早晨，在我阅读《巴黎访谈》一书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关于记忆的讨论还可以以另外一种书面的形式进行。并且，语言表述的缜密和理性也许能使原生野性的记忆获得“第二次诞生”！这样，围绕记忆，我又设计了三个公共问题，写信给每位当初参会的学者，要求他们各自作出回答。与此同时，基于会议的讨论以及参会学者不同的研究兴趣，我又请七组学者（每组两位）互相提问和回答。一切皆与记忆相关，所以，提问没有限制。

说起来，这个问答的环节纯属“突如其来”“节外生枝”，更完整也更正规的是那些在研讨会上被宣讲的诸多独立论文。我原本也是想整理那些

会议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保留我们关于记忆的讨论。可现在看来，这个问答环节显然成了最精彩的部分。对于那次关于记忆的会议来说，这是一个华丽的结局；而对于记忆研究来说，这又是一个开放的、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开始。或许它更为真实、深刻地体现了记忆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丰富性。

与友朋谈学论道是极其美妙的经历，重新讲述关于记忆的记忆，则更为神奇。在完成对这本书的出版构想后，我给朋友们写了一封倡议信，在信中我这样写道：“希望各位亲们在我这封絮絮叨叨的邮件中度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在你们对未来一年的种种期待和设想中，请允许我加入一些小小的、甜蜜的、和完美主义及理想主义有关的梦想。也请各位包容我对记忆的痴迷和好奇。新年将至，我想对你们说：‘愿望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坚守梦想、不顾一切地好好爱自己！’”这样的祝福是永恒不变的——坚守梦想，好好爱自己！

赵静蓉

2015 年 3 月

目 录

001 写在前面的话

Part.01

记忆的公共问答

- 002 问题一：我们常说集体记忆，你认为是否有国家层面的记忆（或称国家记忆）？如果有，中国记忆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就你的研究领域来看，怎样区分不同的国家记忆或国族记忆？
- 027 问题二：遗忘的意义是什么？在个体的层面上和集体的层面上，你是怎样理解遗忘的正当性或必要性的？
- 043 问题三：创伤/创伤记忆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何在？能否结合你自己的研究经历来谈一下？

Part.02

记忆的互文

- 062 陈言 × 刘大先
- 076 苏宏斌 × 王峰
- 087 刘大先 × 胡恒
- 098 张均 × 陈奇佳

100 邹广胜 × 杨建刚

121 贺昌盛 × 肖伟胜

122 朱巧云 × 黄勇

Part.03

记忆理论的个体想象

130 何为文化记忆？ 赵静蓉

137 被给予的“记忆”——历史叙事的观念性建构 贺昌盛

145 灵氛的辩证结构 朱国华

162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 张均

179 论痛苦经历与记忆的诗学意义 朱巧云

188 作为受虐狂的环境 胡恒

200 柳龙光：置身殖民体制内的家国书写与“东亚文化圈”想象 陈言

222 记忆的政治：“历史是被胜利者遗忘的”——从《斗牛》说起 周志强

226 梦幻与灾难——论“新时期”以来的“乌托邦”书写 赵牧

242 作为生命救赎形式的自叙传小说：论郭沫若早期小说 肖伟胜

255 记忆之名：回忆类文学叙事的策略与规则（草纲） 王峰

258 在记忆中塑造自我：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草纲） 王茜

261 论海外华人古体诗词中的文化记忆（草纲） 朱巧云

Part.01

记忆的公共问答

问题一：我们常说集体记忆，你认为是否有国家层面的记忆（或称国家记忆）？如果有，中国记忆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就你的研究领域来看，怎样区分不同的国家记忆或国族记忆？

陈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我本人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战时中日文学关系（1931—1945）、殖民地文学，故而对创伤、记忆的探讨有特别的兴趣。如果某一集团通过国家权力等手段，将本集团的记忆扩展到国家范围，这个集体记忆就变成国家记忆。反之亦然，如果国家通过权力手段将某集体记忆加以记录、创造，其中包括虚构和想象，那么集体记忆就被生成为国家记忆。无论是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层面，国家都需要把共同的记忆和认同塑造融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以此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构筑自己的位置，并且通过集体记忆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战争对于国家记忆的形成异常重要，它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某政权的合法性、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所需要的历史记忆和传奇神话。关于“二战”，中国记忆的特征表现为意识形态性和伦理学向度。

其一，国家记忆的意识形态性。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从中日学界在用词上表现出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国家记忆的不同。日方不少学者使用“十五年战争时期”“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学者则使用“日本侵华时期”“抗战时期”；中国学者习惯在某些词，如在“满洲国”“汪精卫政权”等前面加上“伪”字，以示其存在的不合法性，日本学者则不使用“伪”这个修饰词；有些日本学者在文中还有意无意地使用“支那事变”“东亚战争”“事变”等词汇，并且不加以特别说明。日本某些学者对于这些词的使用或放弃，显示出淡化或转化侵略行为、逃避战争责任的倾向。而关于国共两党对抗战的贡献，由于战后的历史走向，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国家记忆中则是另一番景象。“二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作为抗日主体，付出了巨大牺牲。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败北逃往台湾，红色中国则在历史叙述中抹去、淡化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近年来通过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补充，这一段历史被不断地充实。比如，在中缅印战场上40万远征军携手盟军联合抗日的史实，通过美国通信兵团的照片资料和动态影像纪录、战场作战人员的作战日记手稿、飞虎队军礼服等物品，借展览和著述的方式，那段历史得以还原。

其二，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有不少人认为，“文学史的责任不是判人有罪，而是发掘历史上中国人的血性、智慧和不应泯灭的生命”。因而详加描述和赞扬抗战时期在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人物、团体和事迹等，以此作为战后“抵抗话语”的构成以及情感补偿和道义上的精神支持。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那场战争中被占领区域内中国人民的屈辱经历和体验就被抹杀了。曾经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诗人阿垅幸存下来后，几经周折，到西安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创作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南京》，后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在举办的抗日征文一等奖，结果因为“太真实、过于血腥、渲染了战争恐怖，易产生引导民众仇日情绪之负面作用”

而被封杀。

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关于那场战争，无论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论述，无论是“台湾中心”的还是“大陆中国”的论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东亚”的论述，就因为本来就存在“复线历史”，这些叙述都给我们研究“二战”中国历史提供了多层、多点、多角度透视的新视角，使我们能够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产生更丰富的理解，能够心平气和地去讨论相关问题。

陈奇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我认为存在着国家层面意义上的集体记忆。只要某个国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并且维系了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或者进行过有历史影响力的制度建设），就必然形成此种集体记忆。如讨论国家层面的集体记忆，非常复杂。因为在世界文明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认同、王朝认同、民族认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以及近代以来才形成的民族国家认同等，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上是混在一起的，有交集，也有矛盾冲突。就我个人所见，现在还没有一种成熟的、很方便借鉴的理论能够处理中国问题。现在流行的许多民族理论，尤其是诸如“想象共同体”理论之类，是基于美国经验的一种非常粗糙的处理方式。我完全不能同意。

我自己的处理还非常模糊，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有几个基本点：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不管是否同意，它是我们讨论相关问题的法理基础，也是当今世界关系的基本物质基础。第二，民族国家以及国际法，是西方话语的成果。对它们有必要予以必要的批判考察。第三，就中国国家记忆来说，文化认同占据着核心地位。“夷入夏则为夏”这一点非常重要。

陈雪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所有群体都会有对过去的认识和记忆，这些认识和记忆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而传播和葆有。可以说，文学艺术活动及其作品直接就是这些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综合体——如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文艺作品中的记忆，充溢着人们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或更微妙的感兴，纠集着形形色色的强迫、重复、屈辱抑或血泪。

可以肯定的是，文学艺术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甚或仪式实践本身，也是一种天生就与权力互生共存的话语实践。就历史真切性而言，它也很有可能是错讹的，被诸如对传统的取向，或怀旧感，或对进步的信念等因素所放大、强化或扭曲。在现代社会，这种社会化的记忆往往被用来强化人们自身的信念和认同感。

这样看来，在现世生存于斯的现代民族国家范畴内，当然有国族记忆。如一些海外学者所指认，从整体上看，百年中国文学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作为从中华文化及其现代变局中走来的文人——知识分子血泪的书写，与西方先发的现代文学书写相比，确实具有浓烈的感时忧国（obsessed with Chinese）的特点。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因为仓促，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强盗般争斗的新世界，动辄挨打，屡遭欺凌，当然会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紧张局促，拼凑挪用，急躁赶超。正因为如同暗夜行路，“行拂乱其所为”，故而对自己的命运和境遇或执着，或纠结，萦绕于怀。只要是对当代有所感知而又想有所作为之人、之群，必笃定如此。因此，这显然也不若老派人文主义者那样向往的，像西方文明世界那般的夤缘进取而又优容余裕，那样的正统现代主义。有这样的中国百年和现代文学，其实是正常现象，从民族文学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其实不必感到羞愧不如，

自叹逊色。如果被第一世界左翼学者视若寓言般破碎和杂糅，其实也是正常。在“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大议题面前，天之苍苍其正色乎，又算什么！

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我不知道这里讲的“国家”是 State 还是 Nation，如果是前者，那么，我认为显然是没有；如果是后者，则可能存在，但通常以“民族记忆”（现在也有人称之为“国族记忆”）来替代。我觉得记忆是人大脑皮层的活动，因此，其主体必定是人，几个人或许多人拥有类似的记忆，那么也许就可称之为“集体记忆”，这里“集体”指的是人的聚合。同样，“民族”也可以视之作为一种大型的人的聚合，因此，当然便有可能会共享某些记忆，如对一些共同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尤其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认为有“国家记忆”，当然也不存在什么“中国记忆”，但承认会有中国人共享的一些“集体记忆”，或称之为“中国人的民族记忆”，甚至带有强烈建构性的“中国人的国族记忆”。也正因为如此，好像很少有历史学家使用“国家记忆”一词，但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研究“国族记忆”。

贺昌盛（厦门大学中文系）：

并不存在所谓笼统的“国家记忆”。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汉语语境中，其实混合了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即“地域所属”（Country）、“民族种性”（Nation）和“政权体制”（State）。个体的记忆当然会与这三者发生联系，但真正获得个体记忆认可的主要是地域所属和民族种性，因为这是每个个体确认其生存属性（空间所属及族群所属）的必要前提，个体确认其生存属性的标志就是对于其属地、肤色及语言等的认同；而以政权体制形式出现的“国家”意识，则是由后天的经验所赋予的，它更多地会显示为某种抽象的概念（如果依无政府主义的理解

这个层面上其实连抽象的概念也可以去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那种被称之为“国家记忆”的东西,只可能在“异”态形式下被唤醒,比如“丧国”“去国”“异域生存体验”等;而在常态境遇中,所谓“国家记忆”只不过是与“国家”意识相关的一系列“知识/观念/意念”而已,是一种被综合起来但只具有阶段时效性的“idea”,或者是一种被强制赋予的临时性的属性认同,其与奴隶、子民、臣民、公民等不同时代所赋予个体的邦国、政教、王朝、政权等“idea”形态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当政权体制最终趋于同质化时,以语言、族群及其特定文化为标识的所谓“集体记忆”就会蜕变成为“历史”,其能够得以继续“在场”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一种能让人感到有趣且充满智慧和启发的“知识”。

胡恒(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国家和国族这两个概念,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界定。就我所做的建筑研究来说,中国的空间记忆,与西方(欧洲)的空间记忆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对物质载体并不那么有需求。我的意思是,因为中国建筑的主体几千年来都是以木构为主,更新得很快,无法存留很久。所以,这决定了,关于建筑的记忆,在中国基本上是和它对应的物质实体相分离的。并且,记忆形式(文字、图像)的分配,以非视觉的文字记忆为主——图像记忆的繁荣与平民化要到明代印刷术较发达之后才开始,之前的图像记忆仅只存在于宫廷王府里的界面图轴之中。文字追忆(诗词曲赋)一旦成型、流传,就是一个自主运动的状态。长篇大论的有《阿房宫赋》,寥寥数字的有唐诗如《黄鹤楼》。只要是以中文作为母语的人,都会因此留下关于那些建筑的记忆。我想,这是与西方的建筑记忆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建筑视觉化传统一直都很坚决。或者说,中国的建筑记忆比较艺术化,很诗意浪漫,建筑是为了衬托风景、意境而存在。它给人带来的想象空间的大小是个隐

性标准。西方的建筑记忆比较功能化，其目的也很明确，大多数都与宗教、政治相关。

黄勇（暨南大学中文系）：

有！起码在近代以来。现代“国家”与“民族”概念自西方传入并产生影响以来，我们逐渐有了国家记忆。套用此概念和意识，进一步“发掘”近代以前的“国家记忆”。最常见的说法，如“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还有“炎黄子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耳熟能详的提法。

发端于近现代特殊世界语境下的中国记忆，在我看来，其主要特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伤性”，以及由此引起的“自卑性”，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中国人逢战必败的惨淡现实，让国家记忆充满创伤，并且引发在面对西方人时的极度自卑心理。另一方面，由于饱受摧残和由自卑所引发的盲目自大，中国记忆表现为非理性的“民族自豪感”，所以国家记忆具有双重性。

区分国家记忆的方法，一是基于地域，二是基于语言。

凌海衡（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我没研究过记忆问题，所以无从回答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粗浅的感觉而言，我对所谓集体、国家、国族这类的说法，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就是说，我同意“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换句话说，我同意说“集体、国家、国族”这些都是建构出来的，而既然是建构出来的，就不能等同于人本身，所以就不能说这些建构具有记忆。如果说是有关“集体、国家、国族”的想象性记忆，那么或许可以成立。但这样恐怕就与你的说法相悖了，因为后者其实就是对“集体、国家、国族”的历史的书写而已。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社）：

当然有国家层面的记忆，前现代时期的帝国或者邦国都有自己的政教一体或者道学政一体的教化系统记忆，它们构成了基本的认同要素和统治延续的心理根基，比如我们常说的中国“大一统”传统实际上就是一种帝国记忆。现代民族国家更是具有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特质，特定记忆的塑造和叙述成为凝聚民族/国家的跨地域、超血缘、联合族群的政治、利益与情感共同体。

“中国记忆”的主要特质一言难以蔽之，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记忆至少可以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帝国时代的遗产，就是车同轨、书同文以降所形成的儒道互补“大传统”与形形色色的民间“小传统”的结合，它包括“天下观”“服事说”、朝贡与和亲、羁縻与流官等一系列政治实践。国际上关于领土权的规定，采用的是“传来取得法”，现代中国实际上继承了帝国时代的领土疆域以及文化传统的遗产。二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与试验的记忆，既有反帝反封建过程中抵御外辱、自强立国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翻身、斗争、土改记忆，也包括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系列创新经验、失败教训、革命记忆与创伤记忆。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里面包括对于西方新旧自由主义的吸收，以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对于本土社会主义的探索，这同样构成了思想解放、经济变革的变迁记忆。这些不同部分都有其自身特质，糅合扭结在当代中国记忆当中。

中国当代国家形态本身既非帝国，也难以用“民族国家”来概括，所以中国的国家记忆要比单一民族国家的国家记忆要复杂得多，加之内部包含各种世居、跨境与移民民族，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又采取了包容性很强的政体与国体形式，所以也无法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范畴去涵盖。我的